

《淮南子》的成书与奏书：论《要略》篇之为赋

柯马丁*

一、《淮南子》的文化语境

公元前139年，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在位）至长安按制朝觐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①刘安系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之孙，汉武帝之叔；武帝时年十八，在位仅两年。朝觐期间，刘安向武帝进奏了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班固（32—92）《汉书》本传称之为《内书》^②，而《汉书·艺文志》所存西汉末年秘府书目则将之列于《淮南内》^③。自汉以降，此书通常被称为《淮南子》，西汉著作，传世者二十一篇。上引《汉书》两处都把此书著作权归于刘安名下，尽管多数现代学者都认为刘安扮演的角色是赞助兼主事者，而此书各篇大约出自寿春（故楚之地最后的王都，今属安徽省）王廷聚集的数千侍从文人（“宾客方术之士”）手笔。^④

近年来，《淮南子》作为早期中国思想史的核心著作，终于开始受到西方学术界应有的瞩目。继数十年以来西方汉学界陆续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及个别篇章的翻译之后，^⑤白光华（Charles Le Blanc）与马蒂厄（Rémi Mathieu）最终在

2003年出版了该书法文全译本^①，这是法国学术界多年学术传统的集大成之作。^②如今，马绛（John S. Major）与其他五位学者合作翻译的英文全译本也将在明年问世。和他们的译介工程相关的是2008年3月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东方学会年会上主题为“《淮南子》修辞策略”的一场小组讨论。^③讨论会上，马绛把该书定性为不仅是当时哲学思想之集大成，而且还整体展现了可用于政治、哲学游说的文学样式。马绛提出，该书的非同寻常之处恰在于它试图做到不仅是哲学的——就像许多中国早期文本那样——而且是雄辩的；它有主旨，有目的。^④此外，在这次会议上，陈明远也对《淮南子》末篇，即第二十一篇《要略》作了一次报告，^⑤他对此篇的研究另见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⑥两个月后，普鸣（Michael Puett）和桂思卓（Sarah A. Queen）在哈佛大学主持召开了一场主题为“刘安的帝国蓝图：《淮南子》新视角”的会议。

从两次会议的与会者和组织者身上，拙文受益良多。同时我也发现，尽管有马绛的卓见，对《淮南子》的讨论主要还是思想史方面的，只有不多的学者注意到它的语言和修辞力量。然而对刘安以及在他主持下合著的这部著作，我的思绪却漂移到了另一个方向。作为古典文学学者，我以为寿春王廷实系西汉早期文学中心之一。

首先，刘安的宫廷写作了一大批包罗万象的散文和诗歌，涵盖知识及哲学思想的各个领域。^⑦更具体地说，《汉书·艺文志》归于刘安名下的赋不下八十二篇，其“群臣”也有四十四篇；相比之下，后人眼里刘安时代最重要的赋家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名下则只有二十九篇作品。无足惊讶的是，扬雄

* 本文作者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① 关于刘安的朝觐日程，参见：Griet Vankeerberghen, *The Huainanzi 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 (Albany: SUNY, 2001), 49—51。

② 所谓“内”者，与“外书甚众”及“中书八卷”相对；参见《汉书》21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③ 《汉书》30.1741。其后列出的有“淮南外”三十三篇。

④ 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6），卷二，175—293；此外也不妨参见陈明远（Judson Murray）的概述，见：“A Study of ‘Yao lue’ 要略，‘A Summary of the Essentials’；The *Huainanzi* 淮南子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ostface,” *Early China* 29 (2004): 53—62。

⑤ 参见：白光华（Charles Le Blanc），“*Huainan tzu*,”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d. Michael Loewe, 193—195 (Berkeley: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and th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有关近年来的研究，见 Vankeerberghen, *The Huainanzi 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陈明远，“A Study of ‘Yao lue’ 要略”，45—109；桂思卓（Sarah A. Queen.）“Inventories of the Past, Rethinking the ‘School’ Affiliation of the *Huainanzi*,” *Asia Major* 14 (2001): 51—72；更系统的总结见马绛（John S. Major）等翻译的《淮南子》全译本，即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推出。

① *Philosophes Taoïstes II: Huainan zi* (Paris: Gallimard, 2003)。

② 例如 Claude Larre, *Le Traité VII du Houai Nan Tseu* (Tapei; Paris; Hong Kong: Institut Ricci, 1982)；白光华、马蒂厄, *Mythe et philosophie à l'aube de la Chine impériale: Études sur le Huainan zi* (Montréal,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1992; and Paris: De Boccard, 1992)；Claude Larre, Isabelle Robinet, and 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 *Les grands traités du Huainan zi* (Paris: Les Éditions du CERF, 1993)。

③ 芝加哥，2008年3月14—17日。

④ 马绛，“Refutation and Argumentation in *Huainanzi* 19, ‘Cultivating Effort’.”

⑤ 陈明远，“Summary (*liè*) as a Rhetorical Strategy in *Huainanzi* 21, ‘An Overview of the Essentials’.” 同会上另两篇重要的报告是：桂思卓，“Or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Huainanzi* 17, ‘A Forest of Persuasions’,” and by Andrew Meyer, “Paradox and Anecdote in *Huainanzi* 18, ‘Among Others’.”

⑥ 陈明远，“A Study of ‘Yao lue’ 要略”。

⑦ 白光华, *Huai-Nan Tzu: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in Early Han Thought: The Idea of Resonance (kan-ying) with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of Chapter Six*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41—52, 提供了刘安及其侍从已知著作的带注解的分类目录。

(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肇其论、班固翼其成^①的东汉学者对西汉赋的批评也把刘安当作了靶子；在《汉书》别处，刘安被当作了河间王刘德的反面典型，后者备受称誉的是他对经学的热爱，这恰和淮南王廷的“浮辩”风气形成了对比。^②

除了赋以外，《艺文志》还提到了四“篇”——或许是四首独立的篇章——短歌，即“淮南歌诗”。^③ 南方乐辞总集《楚辞》也称刘安文学侍从之一——所谓“淮南小山”——是《招隐士》的作者；刘安本人为世人所知的是应诏作了一部《离骚传》——据说他只用了几个小时速成的作品。^④ 他还被认为最早编纂了一部楚歌集，经过长期发展，后来在东汉晚期的王逸手里定型为《楚辞》。^⑤ 此外，刘安对“国风”性质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密切呼应了最近出土的手抄本文献里对《关雎》和其他歌诗的讨论，后者譬如有都来自南方的马王堆《五行》篇或者上博竹简里的《孔子诗论》。^⑥ 和梁王刘武、吴王刘濞的宫廷鼎足而立，刘安的寿春王廷是当时三大南方文学中心之一，其中，具备政治游说和道德教化双重修辞功用的“赋”颇擅一时之盛，它在中央皇廷的登场倒要在这之后的武帝治下了。

简言之——这点的意义不仅限于本文对诗学的关注——很显然，尽管《淮南子》是当时字数最多的文本（这个纪录保持到了司马迁《史记》的诞生），但它只是寿春王廷从事的诸多文化工程之一；倘若我们把《淮南子》与它的环境割裂开来，就难免不犯错误，尤其是考虑到《淮南子》本身也涵盖了许多知识领域。从语言和哲学两方面来说，请不妨想想无数押韵的段落，还有刚才提到的政治游说及道德教化主题——这篇文本的许多部分事实上和南方赋家关注的某些问题相关，而其他部分则反映了当时在占星、天文、地理等知识领域的

① 参见：柯马丁，“西汉美学与赋体的起源”（“Western Han Aesthetics and the Genesis of the F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3 (2003)：383—437）以及“The ‘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Fu in Sima Qian’s *Shiji*”，*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3 (2003)：303—316。

② 《汉书》53. 2410。

③ 《汉书》30. 1747。

④ 《汉书》本传，44. 2145。

⑤ David Hawkes. *The Songs of the South: An Ancient Chinese Anthology of Poems by Qu Yuan and Other Poet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5), 33—34 页。白光华, *Huai-Nan Tzu* (第7—8 页) 注意到,《淮南子》的诗体及自我转变的主题(白光华将之理解为道家,尽管作为某种自我修养它其实为道家及儒家思想所共有)与《楚辞》和“楚地巫术传统”不无耦合及关联之处。他还把“《淮南子》与《庄子》在许多核心观点上的密切联系”追溯到“他们共同受惠于楚地诗人的出世精神。”

⑥ 参见：柯马丁，“西汉美学与赋体的起源”及“Excavated Manuscripts and Their Socratic Pleasures: Newly Discovered Challenges in Reading the ‘Airs of the States’”，*Études Asiatiques/Asiatische Studien* 61. 3 (2007)：775—793；柯马丁，“从出土文献谈《国风》的诠释问题：以《关雎》为例”，《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六辑 2008 年 1 月，第 253—271 页。

探索，还有对军事、用于游说的修辞技巧、礼仪和风俗等问题的思考。尽管各个篇章必然反映出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团体的工作，《淮南子》全书则显示他们合作起来是密不可分整体。此外，学识及表达方式的多样和娴熟本身就是寿春宫廷文化所重视的一种最高成就。

尽管《淮南子》诸篇采用了多种文体，包括例如《天文训》、《坠形训》、《时则训》等纯粹的技术作品和事实列举，但许多篇章的创作都采用了当时南方诗歌的习语，这种习语不仅可见于西汉赋，也见于武帝《郊祀歌》。^① 在《淮南子》里，这种习语不仅是哲学思想表述的外在装饰；从赋及近年某些出土文献来看，它也是刘安时代南方哲学思想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虽然《淮南子》的诗化语言常受关注，^②而且早在五十年前，罗常培、周祖谟就（不完全地）列举出了《淮南子》的用韵，^③但实际上还没有研究把这篇著作展现的哲学思想与其诗歌语言联系起来。倘若没有这些诗歌语言，《淮南子》将会是彻底不同的文本——或者根本就不会成书。

西汉赋绝不仅是歌颂或者消遣的文学——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它仅次于骈文，展现出西汉作者可以运用的所有诗歌形式：从《诗经》体的四言句到楚歌短句，乃至《离骚》更复杂的韵律。此外，西汉赋还和所谓纵横游说之士的政治修辞密切相关；^④现存赋作里最漂亮的例子，如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楚辞》里的《大招》，^⑤都称颂修身的过程，这也展现在了《淮南子》及最近出土的南方手抄本里，如代表性的郭店和马王堆的《五行》手抄本。^⑥ 简言之，尽管《淮南子》是淮南王廷现存唯一大著作，但其表面上的独特性和孤立性似乎不过是种幻觉。

① 有关这些诗歌与《淮南子》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参见柯马丁，*Die Hymnen der chinesischen Staatsopfer: Literatur und Ritual in der politischen Repräsentation von der Han-Zeit bis zu den Six Dynastien*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7), 174—303。

② 参见：白光华, *Huai-Nan Tzu*, 第 7—8 页；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 187—188 页。

③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 246—305 页。

④ 参见：康达维 (David R. Knechtges) 及 Jerry Swanson, “Seven Stimuli for the Prince: The *Ch’i-Fa* of Mei Ch’eng,” *Monumenta Serica* 29 (1970—71)：99—116；中岛千秋,《赋の成立と展开》(松山：関洋纸店, 1963), 第 95—279 页, 第 291—307 页；康达维, “Yang Shyong, The Fuh, and Hann Rhetoric” (西雅图大学博士论文, 1968), 第 164—187 页, 第 239—251 页。

⑤ 参见拙作“西汉美学”一文中的讨论。

⑥ 参见：齐思敏 (Mark Csikszentmihalyi), *Material Virtue: Ethics and the Body in Early China* (Leiden: E. J. Brill, 2004)；顾史考 (Scott Cook), “Consummate Artistry and Moral Virtuosity: the ‘Wu xing’ Five Essay and Its Aesthetic,”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2 (2000)：113—146。

二、《要略》篇

《淮南子》的最后一篇，即第二十一篇《要略》，概括了前面二十篇的内容，交待了它们的背景；我的核心问题是：这篇到底要说什么？它用的是什么文学样式？正如本文标题所暗示的，我的结论是这篇应当被恰当地理解为一篇西汉赋，在公元前139年《淮南子》献呈武帝的时候，这篇作品曾通过一定技巧“诵”于皇廷。^①因此它的创作具有所有音声和谐、便于记忆的技巧性特点，使其特别适合背诵和表演。

把《要略》看做“赋”并非着眼于口头创作或传承，而是把它看做特殊的口头表演形式。这点区别至关重要：我并不怀疑《要略》最开始是书面的文本；但我也相信，刻了《淮南子》前二十篇的那一大捆（或者说一大堆）沉甸甸的竹简并不只是交到皇家图书馆的馆员手里。相反，我以为这篇文本也应当曾经作为尧舜之道的最全面、最深刻的指导教材，进奏给年轻因此被看做容易受人左右的汉武帝。我们已经看不见当时其他这类性质的文本了；而且显然也没有其他文本这样宣称过自己至关重要，是哲学智慧的最高结晶。《要略》把《淮南子》称作“刘氏之书”，即天子一族之书；它不仅是在对年轻的皇帝说话，而且是在为他说话，事实上为整个皇族代言。

《要略》使用了不止一种文体，而是运用所有西汉前期作者可以利用的韵文、散文的文学样式，来概括、展现《淮南子》整体。它显示出密集的用韵、旋律流畅的技巧、高度规范化的复杂句法模式——其长度恰好足够辨认出这种句法，然后文章便流动到下一句法模式；最后还有频繁使用的领字和结尾的介词，典型应用在汉赋里作为段落标志。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要略》体现出我认为西汉赋的典型性格之一，即在语言表演的层面上，摹仿性地呈现其自身的主题。^②设若《淮南子》如《要略》所谓包含了有关宇宙的全部哲学，“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那么《要略》本身就包含了能够表达全部哲学的全部语言方式。换言之，蔚为大观的语言表演就用来体现蔚为大观的哲学思想，后者又体现了蔚为大观的宇宙界和政治学。严格说来，我们不妨把《要略》称作刘安的《奏〈淮南子〉赋》，它既展现了前二十篇的内容，也展现了自己成就的文学样式，这种样式如今和刘安的名字及其王廷的文化成就密不可分。它不仅是摆弄小巧的装饰，更显示出其作者是雄文博学的大家——也恰是在这个时期，年青的汉武帝把包括枚乘和司马相如在内的所有汉赋大家从南方灿烂的三大文

学文化中心（吴、梁、淮南）召集到中央朝廷。我们无法判断刘安本人是否是《要略》事实上唯一的作者；接下来，我用的“作者”将暗示其复数形式。不过，这个问题也可能关系不大。有关系的不是实际的作者版权，而是文本的声音——就此而言，这是刘安的声音在对年轻的皇帝发言，不仅作为学术权威，也充满长辈的威严。在这种意义上，《要略》乃至《淮南子》全书的确可称为刘安的著作。

考虑到《要略》提出了前二十篇未曾涉及的新观点，它的首要功能必然是两方面的：把全书建构成整体统一的作品（而非二十篇彼此独立的文章），并把它这样介绍给新的听众或读者。它的文学样式颇为复杂——炫耀式地韵散相间，通篇运用旋律、节奏、用韵、对偶、音声和谐的连绵词——不仅再度呈现出大量前二十篇用过的锤炼精熟的语汇，而且使得汉武帝宫廷里所有熟悉“赋”的诗歌语言者，都会辨认出这篇文章是高度语言技巧的典范。不过，除了这种技巧之外，我们也不能高估《要略》建立起一篇完整的文本、把各篇按固定顺序排列的意图。尽管后来的传统习惯把早期中国文本想象成有篇有章的“书”，所有的历史证据都表明这并非西汉早期文本流通的形态。相反，如近年出土文献表明的，独立自足的说明散文写作只出现在后来——很可能是刘向（公元前79—前8年）遵从成帝（公元前33—前7年在位）诏书——把所有可以收集的作品整理安排在秘府书库里的时候。^③因此，《缙衣》这样如在郭店和上博竹简里发现的那样，系年为约公元前300年的独立的篇章，只在后来变成了《礼记》的一部分。此外，很少战国晚期和西汉早期的手抄本是有标题的，而且没有一篇提及作者名氏。^④只有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要略》传达的主要意图，即建立一部包容独立篇章的统一文本，因为倘非如此，这些篇章或许将独立流传，但不会达到《要略》篇宣称的《淮南子》成就的高度，即尧舜之道的整体蓝图，囊括多种学科的知识总体。《要略》建立起了《淮南子》的整体性，也明确了各篇内在秩序。就这点而言，《淮南子》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百年前涵容多种多样文本的《吕氏春秋》，它作为一部统一整体同样也试图呈现“大一统的哲学，帝国的哲学”。^⑤的确，司马迁就称《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

^① 有关刘向作为皇家目录学者的职责、方法及成就，参见《汉书》30.1701；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98—109页；及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On the transmission of Kuan-tzu,” *T'oung Pao* 41 (1952): 358—66；也不妨参见 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94), vol. 1, 105—110. 关于古书单篇别行的现象，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第93—98页。

^② 关于古书不提撰人，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第15—26页。

^③ John Knoblock and Jeffrey Riegel, *The Annals of Lü Buwe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6.

^① 考虑到《汉书·艺文志》对“赋”的定义是“不歌而诵”。参见：《汉书》1755页。

^② 对赋之作为摹仿性呈现的整体讨论，参见拙文“西汉美学”。

这恰和《要略》称誉《淮南子》的措辞若合符节。^① 两部著作对自己的性质和目的都有类似的表述，而且在《汉书·艺文志》里都被列作“杂家”，左右毗邻。^② 然而《淮南子》和《吕氏春秋》截然有别的乃在于语言：后者较早，沿用东周论说散文的经典语汇，而前者则强调式地采用当代特别是南方的语汇，系统表达了刘安及其王廷的文化意识形态及文化自信。此外，正是诗歌语汇的运用把《要略》和西汉宫廷礼仪文化相联，而《淮南子》的正式进奏也正是在这一宫廷礼仪的语境内。^③

《要略》的整体结构如下：首先是简短的介绍，然后罗列出各篇标题；之后对讨论诸篇，有的很简短，有的则颇详尽。最长的两段讨论是首篇《原道训》和卒篇《泰族训》（卒篇用了193字）；第十六篇《说山训》、十七篇《说林训》一起只用了58字。接下来的部分颇有自荐的意味，作者宣称，倘若要掌握任何一篇的要义，读者首先必须理解前篇的主旨；这就是为什么《淮南子》按照现有特定秩序安排诸篇的原因，即授人君以钥，使他不至于割裂地理解各个题目，而是首尾贯通。通过这种方式，《要略》坚持人君不仅必须谙熟多种政治要题，而且应当以作者苦心安排的顺序逐一研读；因此，《要略》把各个篇章都呈现为《淮南子》整体哲学探索的密不可分的构成部分，而且这部文本的整体大于各篇机械叠加的综合。（请注意，如下所示，各篇顺序通过用韵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分别讨论过各篇之后，接下来的部分是整体思考“学者”应当在哪些项目上有所成就，其后以高潮结笔，即一段称赞前二十篇之美的颂诗（也作为学问的最高成就）。然后作者笔锋一转，开始勾勒前帝国学术时期历史上的伟大战略家和思想家，包括太公，孔子及其弟子，墨子及其门徒，管子，晏子，纵横之士的集团，还有商鞅。最后简短地回落到《淮南子》本身，即一部“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刘氏之书”，总揽了古往今来的全部哲学。总体而言，《要略》全篇展现出紧密、系统的结构，它不仅总结了《淮南子》各篇，也对早期中国思想作了整体的考察，宣布如今《淮南子》最好地概括了其精义。这个整体结构具有明确的形式划分标志，有目录，有系统的安排，自称详尽无遗、包罗万象，最后地位优越的叙述者（或者这里也可以说是地位优越的文本）获得了道德的凯旋——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当时西汉大赋的典型特征，如我们从司马相如赋里看到的。接下来，我将简单讨论一下《要略》的文学模式所采用的美学选择。

^① 《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2511页；并参见 Knoblock 和 Riegel 的讨论（*The Annals of Lü Buwei*, 12—55）。

^② 《汉书》30.1741。

^③ 读者可能还会注意到，两书的另一点区别是尽管《吕氏春秋》也有一篇序（就在《十二纪》之后），它并没有提出任何像《淮南子·要略》里这样的主张。

三、《要略》的结构与意义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紧跟在文章开场的几行之后的诸篇标题的罗列——其实，开场的几句已经是押韵的了，也显示出一些修辞模式。引入这份标题目录的是一句“故著二十篇”，但这份目录绝不仅是简单的列举；它是一份用韵的列举，遵循重复出现的模式，每篇标题都用一个字“有”引出。接下来，我注意到罗常培和周祖谟点明了偶数行的用韵（包括19到20行的用韵），但如我在文本缩进处^①列出的，奇数行也同样有韵：^②

故著二十篇：

-
- | | |
|---------|--------|
| 1. 有原道， | |
| 2. 有倣真， | 真部（韵1） |
| 3. 有天文， | 真部（韵1） |
| 4. 有墜形， | 耕部（韵1） |
| 5. 有时则， | |
| 6. 有览冥， | 耕部（韵1） |
| 7. 有精神， | 真部（韵1） |
| 8. 有本经， | 耕部（韵1） |
-
- | | |
|----------|--------|
| 9. 有主术， | |
| 10. 有繆称， | 蒸部（韵2） |
| 11. 有齐俗， | |
| 12. 有道应， | 蒸部（韵2） |
-

^① 下文我将用同样的缩进格式表示额外的用韵。

^② 本文沿用罗常培、周祖谟所采用的传统韵格，试图将语音学的分析限制在较简单明了的用韵分析上。其中，特别是涉及某些非常规押韵模式之时，我或许过于强调了“合韵”；另一方面，传统注重尾韵，将之作为早期文本唯一可注重的协声特征——以区别于（譬如说）后期诗歌的音韵模式——则可能大大低估了它们的整体听觉效果。（譬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行内、行间的元音和辅音模式。）我有充分的理由猜想对《淮南子》语言的全面语音学分析，包括文本整体的语音转写，将会收获匪浅；不幸的是，从未有人着手这项工作，而它也超出了我的专业范畴。至于用韵模式，我完全不能肯定何时一个“协音”结束，何时一个“合韵”开始；事实上，我根本怀疑这类区别的有效性。然而，在确定可能的“合韵”时，我绝没有高估我们讨论的文本的音声和谐性。相反，这里提醒的每一个额外用韵之外都会还有其他的听觉特征为我们对用韵的唯一关注所忽略。不过，我这里有限的分析将足以指出“要略”是高度模式化的听觉艺术品。

- | | |
|-----------|--------|
| 13. 有汎论, | |
| 14. 有詮言, | 元部(韵3) |
| 15. 有兵略, | |
| 16. 有说山, | 元部(韵3) |
| 17. 有说林, | |
| 18. 有人间, | 元部(韵3) |
| <hr/> | |
| 19. 有脩务, | 侯部(韵4) |
| 20. 有泰族也。 | 屋部(韵4) |

整体上,这段文本有四组韵:(1)真/耕部;(2)蒸部;(3)元部;(4)侯/屋部。“真”/“耕”韵部和“侯”/“屋”韵部在西汉都经常是合韵。^①此外还要注意的,我们必须撇开任何某行应当押韵的成见。罗常培、周祖谟的研究假定是偶数行应当属于整体韵律模式,但西汉文本提供了丰富的奇数行额外用韵的证据。^②西汉作者——或许尤其是那些来自南方的作者——并不按照后来格律诗歌的规定与限制来写作;相反,他们的用韵颇为自由,正如我们在上列表格里第三、第七、第十九行看到的那样。下面将引用的许多例证将更清楚地揭示同样的现象。

无疑,总体整饬的用韵模式是经过有意构思的,而各篇标题也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和罗列——或者,我以为还必须进一步的说:篇章标题本身的成型就是为了按照这种特定顺序来押韵。不仅如此,它表明这些篇章本身被划分开来,目的就是为了形成偶数组合,这一点表现在修辞性的“说”被分成了两篇,而《要略》把它们合称做“山林”则暗示了它们根本的同质性。

但这份押韵的标题清单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把《淮南子》这部皇皇大作浓缩成一块通灵宝玉,让它显得是紧凑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次,它决定了各篇的特定次序;用韵的统一性决定也保证了各个独立篇章在整体序列里的位置。再次,韵律框架支持了白光华的论点(为马绛和其他合作者所接受),即第一到第八篇讨论“基本原则”,而第九到第二十篇则是“应用和例证”^③——请看,第一组韵部恰好结束在第八篇的标题上。

① 参见: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

② 参见拙著 *Die Hymnen der chinesischen Staatsopfer* 提及的大量例证。

③ 白光华, *Huai-Nan Tzu*, 第 3—4 页;更近期的请见:白光华,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第 189 页,“淮南子”篇。

对各个独立篇章的讨论显示出多种诗歌形式。例如“天文训”的这一节:

天文者,所以	
和阴阳之气,	脂部
理日月之光,	阳部
节开塞之时,	之部
列星辰之行,	阳部
知逆顺之变,	
避忌讳之殃,	阳部
顺时运之应,	蒸部
法五神之常,	阳部

使人

有以仰天承顺,	
而不乱其常者也。	阳部

这个段落显示出规整的句法模式:标题之后,通过“所以”引领出段落主体,即高度整饬的八个句子。你们看到的模式是“V(动词)-CN(复合名词)——之-N(名词)”,开头的三个字旋律急促(a-bc),合乎典型的当时楚歌三言句结构,特别是《楚辞》里的《九歌》。最后,这部分用一个陈述结尾:“使人有以仰天承顺,而不乱其常者也。”这一结句格式本身就是高度程式化的,二十篇皆如此,每次都是要具体说明每篇能够带来的好处,敦促读者接受它的指道。罗常培和周祖谟正确地点明偶数行皆用“阳”韵,包括结句的程式化表述;但此外,第七行的“蒸”韵也可以和“阳”韵合并,而一、三句的“脂”、“之”也可以形成一组韵,为本节的整体听觉效果增色。

对“时则训”的总结则运用了另一种迥异的诗歌形式,即和《诗经》相连的古典四言诗韵律。这部分的概括比《天文》更长,但介绍部分和结尾的程式则遵循同样的框架。和《天文训》的概括不同的是,这部分文本的标志不是句法的对偶,但它的用韵则更为密集:

时则者,所以	
上因天时,	之部
下尽地力,	职部
据度行当,	
合诸人则,	职部
形十二节,	质部
以为法式,	职部
终而复始,	之部

转于无极，	职部
因循做依，	脂部
以知祸福，	职部
操舍开塞，	职部
各有龙忌，	之部
发号施令，	之部
以时教期，	之部
使君人者	
知所以从事。	之部

如果只讨论偶数行的用韵，表面上是从第一组“职”部韵(2-4-6-8行)过渡到第二组“之”部韵(12-14-16行)。但这两个韵部是密切关联的，“职”部(-ək)不过是入声化的“之”部(-ə)，而它们在西汉文本里常常是用作合韵的。然而，“职”部的序列里也插入了“之”、“质”、“脂”韵，所有这些韵都有文本证据彼此通押。结果是这段文章的几乎所有行都属于整体音声和谐的用韵或类韵系列，它有力地规定了“时则训”概论的整饬结构。对比一下概论《天文》和《时则》的这两部分，读者将发现两段都是精心构建的，同时作为整体展现了文笔的娴熟老道。这种章法俨然的变奏原则贯穿了所有对二十篇的概述。

《要略》里最高度模式化的段落之一是作者把《淮南子》各篇贯通起来，论辩他们安排的各篇主题次序乃是服务于特定目的，即让君主理解各要义如何融会贯通，锁链一般不可割裂。这一关键的段落由复杂的骈句构成，暗示出每篇的核心概念，因此强有力地辩护了全书密不可分的统一性。此外，这段文章还用作者对听众发言(这种“我们”和“你们”的关系只是暗示，但不难辨认)的语气，把《淮南子》创作的逻辑和效果联系起来。这段文章似乎是用直接发言的口吻对皇帝进奏，按顺序提及了所有篇章，尽管许多情况下并非直接引用它们的标题而是用了替代性的词语，这可能是为了维持韵律结构：

故		
	言道而不明终始，	之部
则	不知所做依。	脂部(韵1)
	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	之部
则	不知所避讳。	脂部(韵1)
	言天地四时而不引譬援类，	脂部
则	不知精微。	脂部(韵1)
	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气，	脂部
则	不知养生之机。	脂部(韵1)

	原人情而不言大圣之德，	职部
则	不知五行之差。	歌部(韵1)
	言帝道而不言君事，	之部
则	不知小大之衰。	脂部(韵1)
	言君事而不为称喻，	鱼部
则	不知动静之宜。	歌部(韵1)
	言称喻而不言俗变，	
则	不知合同大指。	脂部(韵1)
	已言俗变而不言往事，	之部
则	不知道德之应。	蒸部(韵2)
	知道德而不知世曲，	
则	无以耦万方。	阳部(韵2)
	知汎论而不知谗言，	
则	无以从容。	东部(韵2)
	通书文而不知兵指，	职部
则	无以应卒。	质部(韵3)
	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	鱼部
则	无以推明事。	之部(韵3)
	知公道而不知人间，	
则	无以应祸福。	职部(韵3)
	知人间而不知修务，	鱼部
则	无以使学者劝力。	职部(韵3)

罗常培、周祖谟依然只给出了偶数句的用韵，但细致的分析则表明这段文本采用的韵律要复杂得多。第一组韵贯穿前十六句，偶数句用“脂”或“歌”韵(“脂”韵和“歌”韵在西汉文本里是可以合并的)。第二组韵从第九个韵字开始，是合并的“蒸”、“阳”、“东”韵；此后的用韵就会到另一组“之”、“职”、“脂”系列，这组也可以和开头的“脂”、“歌”合韵。如果我们把奇数句的韵字也添进去，就会发现第一、第三组韵部系列里，几乎所有的句子都属于同一韵律系统，包括几个“鱼”韵。

然而，用韵只是这组文本整体模式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这段文章使用了念经式的重复词语、平行句法，使得它们很容易被记忆并且朗诵。考虑到内在勾连的重复句法和密集的用韵，主导这段文本的并非它说了什么，而是它如何表述的整体秩序。在这种高度模式化的秩序里，每个字都被放到了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就好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每个现象都不仅在宇宙里有自己的位置，而且在用语言模仿了宇宙的《淮南子》里也有一个自己的位置。整

体来讲,这段文本的核心消息是:《淮南子》全书高度统一、不可分割,就像这篇文章用语言艺术的模型摹仿性地呈现出来的,排除了任何裂缝或不连贯之处。

若还要为《要略》的表演性语言举出最后一个例子,不妨来看看上述讨论之后紧跟的一篇颂诗。这段文本采取的是不折不扣的南方短歌文体,这在西汉是和楚地歌诗密切相连的,也特别是和皇族成员的诗歌有关:^①

诚通乎二十篇之论, 真部(韵1)

睹凡得要,

以

通九野,

径十门,

真部(韵1)

外天地,

裨山川,

元部(韵1)

其于

逍遥一世之间,

元部(韵1)

宰匠万物之形,

亦优游矣。

若然者,

挟日月而不烧,

宵部(韵2)

润万物而不耗。

宵部(韵2)

曼兮洮兮,

宵部(韵2)

足以览矣!

藐兮浩兮,

幽部(韵2)

旷兮兮,

可以游矣!

幽部(韵2)

这段文本既可以被理解成一首诗分成了上下两节,或者是两首不同的诗。每部分都用了两组韵,但它们非常相近,因此也可以被视作合韵(先是“真”、“元”,然后是“宵”、“幽”)。每个单元都有一个引领的短语,都包含一个完全对偶的长骈句(第一单元结尾、第二单元开头)。虽然文本前半段包括四个标准的三言句,这种句式同样见于武帝的郊祀歌及他处,后半段却是用长的感叹句结尾,通过叹词“兮”来形成句读——这种形式在其他当时南方的诗歌里也很常见。作为整体,这段颂诗把密集的诗歌语汇同宏伟庙堂憧憬的修辞相结合,

^① 《史记》、《汉书》所载西汉诗,多数被归在了皇族成员名下。参见拙文:“汉史之诗:《史记》、《汉书》叙事中的诗歌含义”,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3月,第4—12页。

我们通常从同时代的赋里了解这种修辞,如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或《楚辞·远游》。这段诗歌本身同汉武帝的政治和文化野心形成共鸣,赞叹帝王的武功和刘氏家族文治的辉煌。

四、《要略》的进奏和《淮南子》的成书

所有《淮南子》的传世版本都把《要略》当做卒篇“第二十一”。尽管我们最早的资料来源,即《汉书》刘安本传及《艺文志》都称此著作为二十一篇,《要略》本身却至少三次清晰无疑地提到本书有“二十篇”:第一次是上面引用的篇章列表开门见山地说“故著二十篇”;第二次大约在《要略》中间部分提到:

故

著书二十篇,

则

天地之理究矣,

人间之事接矣,

帝王之道备矣。

第三次上文也曾引用过,即《要略》敦促读者“诚通乎二十篇之论”云云。从这一文本证据以及《要略》展现出西汉赋核心特征的事实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要略》最初不属于《淮南子》一书本身,而其文学形式表明它曾在公元前139年进奏给汉武帝,以向他呈上“刘氏之书”。尽管其二十篇提供了如何维系宇宙及政治秩序的全面教程,《要略》的进奏却是为了政治及道德的游说,以使皇帝遵从淮南王廷汇集的奥义。但是,虽然它最初的创作只是为了某次特别的、甚至一次性的口头游说,《要略》的写本很快或者立刻就被附于二十篇之后,给将来的读者提供指导。它正是以这种面貌从历史的深处流传至今,两千年来为人君、人臣和学者所共同研读。

从这种特殊的视角来看《要略》也为它提出了特别的系年。马绛及其合作者在他们即将出版的译著序里逻辑分明地提出,《淮南子》作为大部头著作,很可能不是在武帝治下开始写作的,而是在之前的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在位)治下,而且可能也是为景帝所作。然而从拙文的分析来看,我以为至少《要略》绝非为景帝所作。如《史记》、《汉书》都提到的,景帝深恶辞赋,而后者当时在南方王廷(吴、梁、淮南)却盛极一时。^①由于《要略》采用了直接与听众交流的口吻,而这个听众只能是皇帝,它一定是特别为了武帝写作的,因为后

^① 《史记》2999页;《汉书》2529页。

者恰好是赋的爱好者；倘若它预设的听众是景帝，则只能产生负面效果。

马绛等学者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要略》的创作远远晚于其余二十篇。这种假说的问题在于，《要略》并不只是二十章之余绪；考虑到各章标题的押韵，它应是一面棱镜，透过它才形成了各章的组织及整体性。此外，《要略》十分明白《淮南子》的性质：它是向天子献策之书。倘若不是为了直接献奏给帝王，而只是为了反映刘安对天子之道的设想，那么这本书最好的下场将会是被看做自吹自擂，最坏的结果则会被看做让淮南王危险的野心昭然若揭。就我们所知的此书的形式而言，它需要一位帝王来做听众。

有几点原因决定了这位帝王不大可能是景帝。首先，不仅《要略》而且《淮南子》整体都常常采用南方赋的艺术性语言。这意味着全书的二十篇也不可能被汉景帝欣然接受。此外，武帝十六岁登基，两年后即被献上此书，这时他不论就年龄还是统治时间来说都算得上稚嫩；而生于公元前188年的景帝则从公元前155年开始统治汉帝国。由于刘安的前一次例行朝觐乃是在公元前146年，^①《淮南子》的写作一定是在此之后；但当时已经统治了近二十年之久的景帝不大可能还需要一部勾勒出治国之道的蓝图，何况还是出自同龄的南方侯王手笔。根据以上理由，我的意见是《淮南子》全书而不仅是《要略篇》都是在公元前141年，即武帝新登大宝以后成型的——这时候的皇帝是子侄辈的年轻人，显然需要长者的教诲，而且不同于其父的是，他还对当时南方的流行文学颇感兴趣。很可能，刘安本人称帝的野心被挫败之后，^②他或许就有了《淮南子》的写作构想，以它为工具来获取皇廷“精神领袖”的地位——或许甚至步武周公，扮演类似摄政的角色。

这并不是说《淮南子》是从无到有匆匆成书的。由于二十篇展现出彼此不同的多种知识领域以及文体选择，它们很可能由学有专攻的不同小组写作而成。它们摇曳多姿的写作并非援笔立就，也并非出于同一主旨；这些学者的大部分知识一定都是公元前141年现存并且以某种方式已经成文的，被哀辑汇编进了《淮南子》的二十篇。只是通过这次统一化的编纂，而非作为各篇代表的不同学术传统的原创作者，《淮南子》整体才形成了统一的信息，而且也只是通过作为最终修辞姿态的《要略》才把各篇（凭它们押韵的标题首尾完备）统一成有固定边界、固定内部秩序的单一著作。

因此，我建议，是公元前139年的进奏才产生了如我们现在所知形态的这部著作，而且塑造了《要略》写作及表演的形态的，正是年青的帝王热情接受的

^① Michael Loew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Qin, Former Han & Xin Periods* (221 BC-AD 24) (Leiden: E. J. Brill, 2000), 242.

^② 参见 Vankeerberghen, *The Huainanzi 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

时下流行文学。其结果是，《淮南子》成为有汉第一部“大著”，武帝皇廷既是其整体创作的目的，也是其奏呈的场合，这些都应当被看做受到当时南方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就哲学及修辞两方面而言，《淮南子》都是对西汉王朝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强有力的介入。它以文本形式统一了广阔、多样、事实上彼此独立的篇章，这是治国之策的最出色的总结，因为当时年轻、野心勃勃的君王正发现，他所统治的同样是新近统一、尚不稳定的帝国。因此，设若没有刘安于公元前139年的朝觐，《淮南子》作为划时代的统一的著作或许将永远不可能出现。倘若它的各篇彼此独立，大概无一将流传至今。

[附记]我谨在此感谢柯睿(Paul Kroll)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的许多建议和订正，从中我受益匪浅。此外还需要致谢的有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班大为(David Pankenier)、金鹏程(Paul Rakita Goldin)、皮德生(Willard J. Peterson)等教授。我在2008年五月的哈佛会议宣读了本文初稿之后，随后的几稿曾在德国(Erlangen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及圣塔巴巴拉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每次报告之后，我都会收到极好的评论，它们帮助本文形成了目前的面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九辑]

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九辑/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301-17357-2

I. 北… II. 北… III. 古文献学—研究—中国—丛刊 IV. G2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0907 号

书 名: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九辑

著作责任者: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

责任编辑: 王 应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357-2/H·25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34 印张 60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